

師道與書道：讀《錢穆先生書信集》有感

(拙按：本文純乃國鍵之雜感。況年老目盲，但憑憶記。其是耶非耶，也請大家包涵了。)

(一)

二零一四年耶誕之月，黃浩潮、陸國燊兩學兄寄贈所編《錢穆先生書信集——為學、做人、親情與師生情懷》(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14年12月初版。下簡稱《書信集》)，細讀書中數函，不無感慨。

(二)

世之所謂儒士者，除了學問之外，更須具備儒家至推崇的道德人格。有學而無德，儒士云乎哉？

是以大儒錢穆先生之訓弟子也，品行居先，學問其次。此余英時先生於此書序文記先生告誡之曰：「學術的創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要我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書信集》，p.6)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三)

可歎的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歐美方興的經濟掛帥、事事講求「成本效益」的功利主義大學庸俗化的洪流之下，任職新亞書院想做個有高尚品格的「堂堂正正的人」，未必容易。先生於一九六五年卸任院長時，已察覺中文大學成立後，研究所研究員與在校教學者「報酬相差過遠」，「又兼在上之人各以私心為好惡，漸有奔競趨媚之風，日增抑鬱不平之氣，不僅學問不長進，而性情志趣亦日以汙下。」(1965年先生致余英時函，《書信集》，p.7，余序。)

這不正亦今日學術界的貼切寫照？

(四)

戀棧錢財名位抑或退而修德立言，錢先生選擇了後者。此先生之所以可敬且足為人師也。

論實，切志做學問工夫者，先須拋棄名利。蓋俗世社會之名利關

爭，甚費氣力，何暇顧得同樣要殫精竭慮的學術？此所以先生於一九七三年對弟子吾恩師嚴耕望先生之決意放棄申請晉升為中文大學史系教授，極為讚賞。原因是，此「可省自己精力，亦減無聊是非」（覆嚴耕望函，《書信集》，p.54）。在學術上想要有大成就呢，也就祇能學做嚴師之「澹泊自甘，寂寞自守」了（全上）。

安貧樂道殊不易。當日錢先生慨歎的是：「大陸流亡海外學術界，二十餘年來，真能潛心學術，有著作問世者，幾乎無從屈指。」（並見上引）至如再經四十餘年後之今日，大學教席報酬相對更豐厚了，情況復又如何呢？唉！

(五)

此無他，誤墮世俗塵網也。新亞書院以「誠明」為校訓，乃以治學之「明」，恢復我真本性之「誠」。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藉此或可稍抹俗世權勢名利蒙污真本性之塵染焉。

錢先生身體力行，不羣不黨，更不喜與政界拉關係，因而「自問數十年來絕意入政界，此下亦將如是」（1959年先生覆弟子余英時函，《書信集》，p.82）。

故此，新亞書院標榜的，不是做大官、發大財。而是誠誠明明，專心治學，為承傳吾傳統文化並注入新生命（包括西方文化）以振興吾民族而盡獻一生。

(六)

新亞書院之守護傳統儒家文化，並不代表錢先生在政治上就是贊成獨裁。對於中國歷史政治制度的研究，錢先生和嚴先生都十分重視。秦漢丞相乃「副天子」，節制君權；大唐三省制度，「不經鳳閣（中書）鸞臺（門下），何名為敕」，君權同樣受到限制。祇恨宋代廢相，然後君權愈張，政治愈見黑暗。這相信已是六七十年代新亞文史系同學的普通常識了。

今之視儒學必為專制獨裁，不一定完全正確。

(七)

師之為道，不全在於學問，而尤貴乎人格，斯所謂人師也。考之書道亦然。書道不因書寫技法之學而顯，而祇會藉書家個人之品德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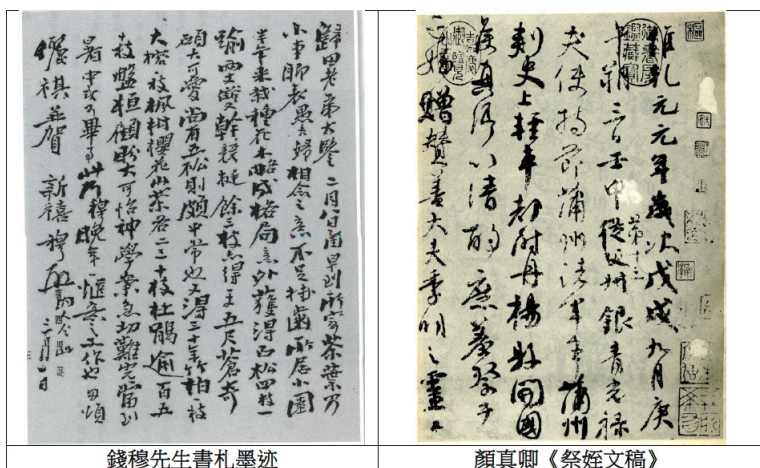
養而彰。

書法者技巧，書道者精神。沒有高雅的品格操守，難有清雅的書法作品。

故曰：字如其人。

(八)

觀《書信集》錢先生信札翰墨，厚重端雅，圓適舒和，甚得顏真卿的神髓。今試將書中六八年先生覆嚴先生書函之書法(p.58) 與真卿所書《祭姪文稿》相比較，或證吾言之非虛也：



(九)

至如先生七二及七四年所書三函(pp.62,64,66)，字體氣度雍宏，活潑多姿，頗見褚遂良筆意。

按一九三一年錢先生與沈尹默同在北京大學任教，時沈先生大力推崇褚書，先生有否受他影響，國鍵不得而知。所知者，顏體本出褚書。而真卿遂良皆大唐忠烈名臣，堅貞不屈，巍巍然道德君子。顏褚於書法中流露的高尚氣節，與先生之性情正相脗合也。

(十)

錢先生的書法，於顏體褚意之中自具風格，令人喜愛。是則其超凡成就，又豈僅學術上之精闢著述而止？

二零一五年四月清明節後五日，眇人潘國鍵稿於多倫多如心齋燈下。窗外斜風橫雨，倍思嚴師師母。祈願兩老於天國淨土，幸福快樂。